

栏目顾问:顾之川 策划:王健

编者按

2026 年,恰逢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,周口日报《文脉悠长·周口文化人物》栏目采访组特聚焦这位西华籍法学大家。采访过程中,武汉大学法学院给予鼎力支持与悉心协助,不仅提供了诸多珍贵史料,更给予专业学术指导,谨在此致以诚挚谢意。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,马克昌先生以一生之力拓荒刑法学疆域、铸牢法治之魂,用学识风骨为中国法治进程刻下深深印记。其事迹与精神,更是故土周口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。值此百年诞辰之际,回望先生的铿锵足迹,既是对乡贤的深切缅怀,更是对其精神的赓续弘扬。愿先生之志薪火永续,照亮中国法治事业砥砺前行之路。

□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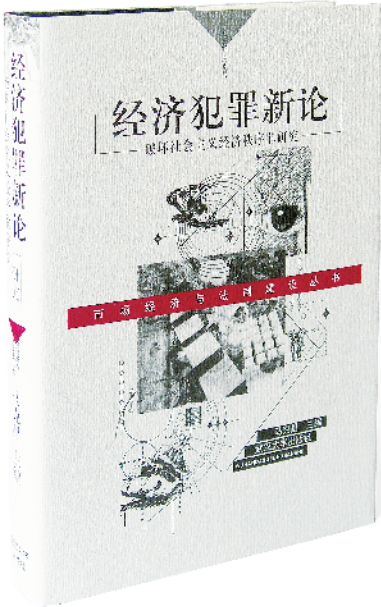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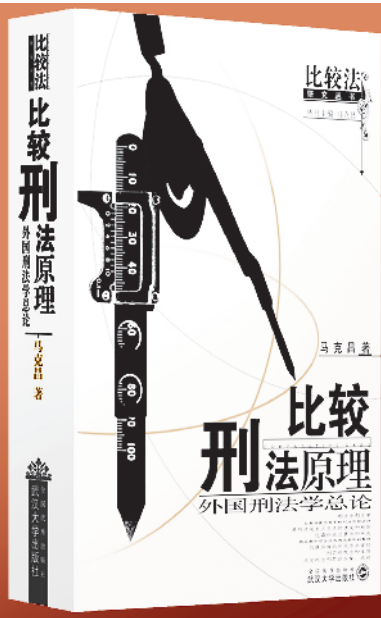
笔耕不辍:淬炼刑法学传世经典

在刑法学界,马克昌的名字如丰碑般矗立。他不仅以卓越担当参与“世纪审判”、以满腔热忱重振法学殿堂,更淬笔为刃,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岁月中笔耕不辍。他的作品承载着对真理的追求与对法治的期许,既构建起系统的刑法学知识体系,也为中国刑法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严谨的治学精神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法学家。

1979 年,我国法学领域百废待兴,亟须权威教材指引教学方向,构建知识框架。在此时代背景下,马克昌受邀担任副主编,参与编撰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《刑法学》。这是我国恢复法学教育后出版的第一部权威刑法学教科书。

编撰过程中,马克昌秉持“求真务实”的治学理念,既扎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,梳理总结典型案例与经验,又借鉴国外先进刑法理论成果,反复推敲每一个概念、每一个条款。为确保教材的准确性与权威性,他常常埋首图书馆,查阅海量文献资料,与编撰团队成员彻夜研讨,对有争议的知识点逐一辨析、达成共识。1982 年,该教材正式出版,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刑法学体系,清晰界定了刑法的基本概念、原则,及犯罪构成、刑罚体系等核心内容,为高校法学专业教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框架,填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空白。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曾评价:“统编教材《刑法学》一书开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的道统。”此后数十年间,这部教材被广泛采用,成为刑法学领域的经典入门读物。

马克昌深知,刑法学研究需要不断深化、拓展,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。因此,他将研究重心转向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系统梳理,牵头主编了《犯罪通论》与《刑罚通论》。这两部著作被誉为“刑法学百宝书”。在《犯罪通论》中,马克昌打破传统研究范式,结合丰富的司法实践案例,对犯罪构成要件、犯罪形态、共同犯罪等核心问题深入剖析,提出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。《刑罚通论》则聚焦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,对刑罚的目的、功能、种类以及量刑、行刑等问题系统阐释,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。两书出版后,迅速成为刑法学研究的典籍性文献,几乎是每一位刑法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资料。著名刑法学家高铭喧、赵秉志等评价道:“这一体系在宏观上对我国通行的犯罪论体系有所突破,在微观上对通行的犯罪论体系作了发展。”其学术影响力跨越数十年,至今仍在刑法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

马克昌部分著作。

法学泰斗 故土荣光

纪念西华籍当代著名法学家马克昌先生百年诞辰下



2006 年 5 月 31 日,马克昌在博士论文答辩现场。

彭年生 摄

人物简介

马克昌(1926.8—2011.6),河南西华县人,当代著名法学家、法学教育家,新中国刑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,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喧教授并称刑法学界的“北高南马”。他曾担任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,参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修订工作,与韩德培教授共同牵头重建“文革”期间被撤销的武汉大学法学院,1986 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,重铸“珞珈王牌”,培养的毕业生多成为刑法学研究及实务领域的中坚力量。其著作有《比较刑法原理——外国刑法学总论》等,新获多项国家级、省部级学术奖项,在法学界影响深远。

身的他,对学术研究的牵挂也从未减退。病重住院期间,他还拟定了与《犯罪通论》《刑罚通论》相配套的姊妹篇《百罪通论》的编写计划,并亲自撰写 5 万余字书稿。直至逝世前,他仍惦念着尚未完成的个人著作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》。

秉笔直书:以法之名守护公平正义

“做人要正直,不要圆滑。”这是马克昌对子女的谆谆教诲,更是他践行一生的人生准则。作为法学泰斗,他不仅以深厚学识构建刑法理论体系,更以刚直不阿的风骨、侠骨柔情的情怀,在司法实践中为百姓撑腰、为正义呐喊。从纠正行政机关越权办案,到为无辜者洗刷冤屈,再到顶住舆论压力坚守法治初心,他用一次次秉笔直书的担当,诠释了“中国法律人的良心”的深刻内涵。

1988 年 7 月,武汉市某企业经理卢某突遭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抓捕,被冠以“投机倒把”罪名,不仅 5 辆大卡车被没收,还被责令缴纳 11 万元罚款。走出看守所的卢某走投无路,找到时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马克昌。听完事情原委,马克昌怒不可遏:“刑警队咋能非法插手经济纠纷?”他当即报请市人大向公安局提出纠正意见。却遭到对方无视,卢某还被迫加罪名报检察院批捕。

面对阻力,马克昌没有退缩。多次沟通无果后,1990 年 1 月 12 日,他联合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其他 7 位常委,在武汉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,提出市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第一个质询案,明确指出此案属于公安机关越权办案,必须依法纠正。这份充满勇气的质询案,最终推动武汉市政府限期督办。武汉市公安局不仅退还了卢某的财物和罚款,还书面汇报了工作失误的原因。更令人动容的是,当卢某事后拖欠甘肃某私营企业款项避而不见时,马克昌又以长辈名义写信劝说,促成还款协议达成。“他的较真,只为维护法律公正;他的热心,只为让百姓感受到法治的温度。”他的学生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。

“证据是案件的灵魂,没有证据就不能立案,形成不了证据链就要撤案,天王老子打招呼都不行。”这是马克昌反复强调的执法理念。在他看来,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,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百姓身家性命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河南某地曾发生一起荒唐案件:三名法官依法执行经济案,却被当事人捏造事实诬告。受理法院仅凭某领导批示,就判处三人有期徒刑三年。相关部门在复查时发现判决不公,却因种种原因不敢撤销,只好带着案卷专程向马克昌请教。马克昌仔細审阅案卷后,依据法律条文和证据规则,明确出具了“应以证据定性”的法律意见书。他的意见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,责成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错误判决,

为三位法官洗清了冤屈。

2006 年,武汉市某法院对未指使、未在场、未动手的李某,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马克昌接到市人大转来的咨询函后,连夜翻阅案卷,发现这是一起因法院不采信公安机关侦查结论而导致的错案。他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,并放下手头事务,连夜撰写《关于李某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意见》,最终推动相关单位纠正了错判。

即便对陌生人的求助,马克昌也始终怀有悲悯之心。一次,一位素不相识者因琐事被判死刑,家属几经周折找到他。马克昌没有因“事不关己”推诿,而是认真研读全部卷宗,发现司法机关量刑过重。他迅速致信当地司法部门,提出以证据定性的意见,力促案件重新审查。最终,法院参照他的意见予以减刑,挽救了一条生命。

在重大社会案件面前,马克昌更是顶住舆论压力,坚守法治初心。2009 年 5 月,湖北省邓玉娇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舆论众说纷纭。作为法学权威,马克昌多次出席司法部研讨会,客观发表专业意见。案件判决后,社会争议仍未平息,部分观点情绪化严重。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,他在《法治日报》发文,明确指出该案定性及法律适用正确。文章发表后,争论很快平息,但他因此遭到部分人的攻击。面对非议,马克昌坦然处之:“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应秉公护法、坚持真理,不应被舆论左右。”这份不迎合、不盲从的坚守,正是法学家风骨的生动体现。

在治学与实践,马克昌始终倡导刑法的谦抑与宽容。他认为,刑事司法要改变“动不动就用刑法”的观念,坚持“可捕可不捕的不捕,可诉可不诉的不诉,可判可不判的不判,可杀可不杀的不杀”。这背后,是对生命的尊重,更是对百姓权益的守护。

2007 年,正值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六)》实施的关键期,已逾八旬的马克昌怀着对故土的深厚眷恋,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河南省西华县,在县委礼堂为全县政法干部作了一场高水平的专题讲座。面对来自县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局、司法局以及各乡镇基层的数百名政法干部,老人精神矍铄,声音洪亮。他结合当时最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六)》适用问题,深入剖析了基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热点难点——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把握到正当防卫条款的具体适用,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农村常见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,内容扎实,切中要害。讲座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阐释,又穿插了他在“两案”(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)辩护及长期司法咨询中积累的鲜活案例。他特别强调:“基层政法干部身处执法第一线,掌握的是百姓对法治的最直接感受,一言一行关乎法律尊严与人心向背。办案不仅要合法,还要讲情理;既要坚守刑法谦抑性,又不

能放纵犯罪。”整场讲座持续近两个小时,现场数次响起热烈掌声。这场饱含桑梓深情的回乡授课,是先生对故土法治事业最真挚的反哺,为基层执法者筑牢了信仰之基、淬炼了专业之力。

薪火相传:基金会延续法治初心

为更好地培育法学人才、促进学术研究、服务社会发展,马克昌于 2007 年 11 月 27 日出资并募资,推动成立“武汉大学马克昌法学基金会”。这一全国高校法学领域首个以个人姓名命名且正式注册的基金会,成为承载先生法治理想的重要载体。

基金会的成立,源于马克昌对法学教育的深切牵挂。从教 60 余载,他深知人才培养对法治建设的重要性,也目睹过无数寒门学子求学的艰辛。他说,成立基金会是为了传承“厚德载物、自强不息”的治学精神。他率先垂范,多次将稿费等个人收入悉数捐入基金会,用实际行动为基金会发展奠定基础,也为后辈树立了尊师重教、反哺学界的榜样。

按照章程,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涵盖支持武汉大学法学院学科建设、教学科研设施更新、重点课程、青年教师成长、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,并支持各类与法学教育相关的公益项目。从资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,到奖励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;从助力法学学科前沿课题研究,到支持法律援助等社会实践,基金会的每一项工作都紧扣“培育人才、服务社会”的宗旨,精准延续着马克昌先生的法治使命。

多年来,基金会坚守初心,在法学人才培养与推动学术研究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。它不仅为家境困难的法学学子送去温暖,帮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钻研学问,也通过资助科研项目,为法学理论创新注入动力。武汉大学法学院许多教师的研究曾得到基金会支持,他们也成为传承先生学术思想、推动刑法学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基金会的影响力还延伸到法治实践一线。2025 年 6 月,北京律海芒芒科技有限公司专程向基金会捐赠 10 万元,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建设,旨在提升学生志愿服务能力、援助弱势群体案件等。此举既是对基金会公益价值的认可,也使马克昌先生“秉公护法、服务社会”的理念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实践形式,让法治的温暖传递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身边。

学高德馨:辉映中国法治征程

在新中国刑法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史上,“北高南马”的美誉如雷贯耳,光耀法治长空。“北高”是中国人民大学高铭喧教授,“南马”便是马克昌教授。两位法学巨擘双星辉映,共同奠基了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大厦。

高铭喧曾满怀敬意评价挚友:“他是我素来尊敬的一位刑法学家,功底深厚,不仅对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诣,同时对外国刑法学,特别是大陆法

系有深入的研究,可以说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”这份跨越南北的学术共鸣,是两位泰斗惺惺相惜的见证,更推动了中国刑法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化与繁荣。

马克昌的一生,是“学品与人品相统一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”的生动典范。他深耕法学数十载,著作等身,撰写的刑法专著影响深远,全国超过百万法学学生曾捧读其著作,从中汲取法治智慧。他曾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、名誉会长,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等职,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,为刑法学研究指明方向。马克昌还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,他提出的“限制死刑适用范围”“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”等建议,切中司法改革要害,被纳入相关政策制定考量,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。

相较于学术上的辉煌成就,马克昌在育人之路上的耕耘更熠熠生辉。“先做人,后治学”——这六字箴言是他教书育人的核心准则,更是他一生德行的凝练。60 余载春秋,他悉心培育的法学“马家军”遍布学界、司法界、政界,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。他的学生至今仍铭记恩师教诲:“马先生不仅传授专业知识,更以刚直不阿的品格为我指引人生方向。在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,先生的法治理念始终是我坚守的准则。”“老师一生刚直不阿,有副侠骨柔肠,他的人格修养像春雨般润物无声,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”

凭借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建树与深远影响,马克昌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爱护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等多位国家领导同志曾亲切接见他,对他在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,勉励他继续深耕学术、培育栋梁。2011 年,马克昌积劳成疾,卧病在床。消息传开,党和国家领导人牵挂他的病情,通过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密切关注治疗进展,反复叮嘱湖北省和武汉大学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救治保障工作,协调国内顶尖医疗专家为他会诊,提供全方位治疗支持。这份关怀,既是对一位法学大家的敬重,更是对他毕生奉献的肯定。

2011 年 6 月 22 日 19 时 16 分,马克昌因病医治无效,在武汉与世长辞,享年 85 岁。许多纪念文章这样写道:他的一生,是为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不懈奋斗的一生;他“厚德载物、自强不息”的精神和“刚直不阿、秉公护法”的品格,值得后人永远铭记;他为新中国刑法学体系构建和法学人才培养作出的贡献,不可替代,永载史册。

珞珈山下,法治路上,马克昌以拓荒之志奠基刑法学,以赤子之心守护公正,以育人之德传承薪火。他的著作照亮治学之路,他的风骨感召后继前行。如今,基金会赓续其使命,“马家军”接力耕耘,先生的法治精神如东潮碧波,奔流不息;如珞珈青松,常青不朽,永远滋养着中国法治的沃土。(本版其他照片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提供)



马克昌(左)作为辩护人在审判庭上。



马克昌(中)2007 年返乡讲学时与家人合影。(宋静灵 提供)